



## 本期专题

[《白银资本》究竟犯了谁的忌？](#)

[重构全球主义的世界图景](#)

陈燕谷

[《白银资本》序言](#)

王国斌

[欧洲路灯光影以外的世界](#)

刘禾

[质疑《白银资本》](#)

徐友渔

[《白银资本》究竟犯了谁的忌？](#)

刘禾

[反思习以为常的世界历史](#)

王 页

[关于《白银资本》](#)

叶坦

[《白银资本》导读](#)

卫 斯

[《白银资本》书评摘要](#)

[看不懂的争论](#)

萧 俊

[普遍性的历史建构——《万国法》与十九世纪国际法的流通](#)

刘禾

6月16日本版刊登了徐友渔先生的《质疑〈白银资本〉》一文，今天本版刊出刘禾女士的《〈白银资本〉究竟犯了谁的忌？》，两篇文章的观点是对立的。我们的态度是：在学术问题上，媒体永远不应当是单一流派的沙丁鱼；当给不同观点的讨论乃至激辩提供具兼容性的平台。我们渴望彼此尊重、充分说理而又据理力争的良好氛围，尚有待知识界共同营造。——编者

## 《白银资本》究竟犯了谁的忌？

刘禾

前不久，我在《读书》杂志五月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欧洲路灯光影以外的世界》的文章，受《南方周末》和互联网上的批评。对此我不能不予以回应。

徐友渔不喜欢《白银资本》一书的主要理由是：“如果《白银资本》之说成立，那么自严复以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数代人学习和借鉴西方经验，反思和批判自身传统中过时因素的努力，都是白费。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人推崇和提倡‘德先生、赛先生’都错了。所有这些人都不过是西的上当受骗者和牺牲品。”我想提醒徐友渔，《白银资本》所涉及的时段是十五至十八世纪，对于发展密切关联的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的那段历史则没有正面的论说，而《白银资本》与新文化运动有怎样的逻辑关系，这是需要论证的。何况徐友渔提到的四个人中，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都是中国人，他们所推动的这种抵抗延续至今，因此五四传统也绝不能只用“德先生、赛先生”来概括。《白银资本》与五四运动是互为否定的，那么他就有义务向我们大家说明这个逻辑关系是如何推演得出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人“都不过是西方中心论这种谬论的上当受骗者和牺牲品”这论，我想明眼人自己可以作出判断。

我曾给《读书》杂志写过文章评述萨义德的《东方学》和伯纳尔的《黑色的雅典娜》等著作。最近之所以又撰文介绍《白银资本》，是因为这三部著作极具代表性，构成了当代西方学术转型中的。五月号《读书》的文章里，我的原话是这样说的：“这些路标对中国学人提出的挑战，已大大超出是否适合中国实际的老问题，更不是要不要‘反西方’的问题；它真正的挑战是：中国学人处在当今文化格局里，应承担何种角色，或不承担何种角色？”徐友渔对我上述的话进行了偷梁换柱的引用，而那些理论著作，而是去找路人四处打听，声称“我请教了不少西方著名学者，他们都不知道有这样才能理解他的这句话呢？是徐友渔向我们公开承认他自己没有做过任何研究，还是证明自己根本不力？否则，他怎会误以为白人学者的脸上一定贴着理论专利的标签？有人拒斥萨义德、伯纳尔和弗兰不是什么新鲜事。西方学界有不少人对福柯、德里达、斯皮娃克、斯图亚特·霍尔、鲍德里亚以及要贡献的其他理论家都抱有同样的敌意，这一点徐友渔先生是否听说过？可惜徐友渔没有能够坦诚：“西方著名学者”究竟是个什么人，否则，我相信，人们对这场是非会有一个公正的判断。

刘北成先生翻译的《白银资本》今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后，在中国学者中产生了热烈的反响。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中央编译出版社等单位都召开了有著名经济学家参加的专题讨论会。有关《白银资本》的讨论在《中国青年报》(3/21)、《中国读书商报·书评周刊》(3/21)、《中华读书报》(3/29)和《各大小报》刊出，而我自己的文章则是五月中旬才在《读书》上发表。奇怪的是，徐友渔先生单单把我为他攻击的靶子，指责《读书》不够专业，理由是早先陈燕谷先生的书评和我的文章都是由“弄文是，从未听说徐友渔自己与世界经济史有过什么干系，而他在《质疑〈白银资本〉》一文中自称‘专业’为专业，这在人们眼里就十分可疑了。我本人在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给比较文学系的博士班开程，约有十个年头，还是第一次听说有个什么叫做“当代西方学术”的专业。如果徐友渔先生能搞清楚的话，那他不至于在剥夺别人发言权的同时也牢牢地封住了自己的嘴巴。

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一书中，举出大量的有关白银贸易的证据，对十五至十八世纪末亚洲和构中所处的重要地位给予了新的定位。但此书不是没有缺憾，我在《欧洲路灯光影以外的世界》一书中第一手汉语文献的缺乏，因为弗兰克完全有可能在这些文献中发掘出对他更有利的证据，或对已正当。当弗兰克今年五月在社科院访问期间被问及这一点时，他谦虚地说，《白银资本》所做的只是的研究有待于中国的和其他非西方学者的参与才能完成；相比之下，从亚当·斯密到桑巴特、韦伯代表的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经济理论，已有了几百年的传统和传播，要想质疑这样一个权威的知识体系的共同努力不可。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针对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理论提出了另一套关于早期解释，这是一部综合性的理论书，而不是研究白银流通的专著。正如韦伯、布罗代尔、沃勒斯坦等人在一部综合性的理论著作中，著者须在尽可能广泛的领域里吸收大量的有关研究，而在这方面，非学术成果的把握是极为可观的。

徐友渔误以为第一手材料就等于证据，于是相信自己抓住了弗兰克的把柄，但不幸又打错了地方。都以为掌握第一手文献为准，那么韦伯、布罗代尔、沃勒斯坦等人的著作全都经不起推敲，更何况弗兰克比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略胜一筹的地方恰恰在于他重视了欧洲以外的世界经济研究的最新（1990年）书中引用了滨下武志、阿布·卢格霍特、王国斌等许多学者关于亚洲贸易的个案研究，这些个案研究《白银资本》的写作后，有力地支持了弗兰克的论点。徐友渔断章取义地引用阿布·卢格霍特的《日本》一书里面所征引的当代国际学界（包括阿布·卢格霍特自己）的集体劳动成果，贬斥为“经验证据之不完备”。徐友渔究竟掌握了什么经验证据和统计数据，就可以小看各国学者多年的研究成果。

最经不起推敲的是，徐友渔先生既然表现得那么热衷于原始文献，那他为什么把查辞典看得比靠？在《欧洲路灯光影以外的世界》一文中，我曾提到199年夏天在伦敦使用英国国家档案馆和一些情况。在对1830年前后中英政府之间外交照会加以分析之后，我发现十九世纪中叶，英国政府文禁止中国人使用“夷”字，这跟“夷”字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如何被传教士或“汉文正史”（蛮人），而barbarian话语又如何进入英国议会的辩论有着直接的联系。另一相关的发现是“夷”字之前无此固定的译法，因为十八世纪初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档案文献（并非我的发明）显示是stranger（陌生人）或foreigner（外国人），此译法直到1807年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1 英字典）1815—1820）时仍被沿用。这段公案我在文章里已讲得清清楚楚，也就是说，我关注的是及鸦片战争时期英国议会的有关辩论，而不涉及“夷”字在汉语自身几千年中的词源变化，更不是辞典里是褒义还是贬义这一类中学生才关心的问题。当我们涉及两种语言之间复杂的翻译史时，典、字典，包括双语词典，它们对此类研究的价值都是极其有限的。如果以搞语言哲学著称的徐友渔闹不懂，那么请问刘禾和徐友渔比起来，到底谁“太不学术”？

何况满清人关后的“夷夏”之争，使得“夷”字早已成为清代经学反复考证和阐释的重点，任何界定，它关系到满人统治汉人的政治合法性等等。对历史档案无动于衷、对经学文献视而不见的认为“夷”字是一个技术性问题，只消查一下《辞源》，问题就都解决了。于是，他从《辞源》里来，好像取到法宝似地警告说：“身居国外的刘禾女士，在与自己的同胞论战时，还是翻翻中国的可是，身居国内的徐友渔先生忽略了一个要命的细节，那就是他没有先去查一查《辞源》到底真的版本是不是早于1908年？是不是早于我上面提到的那些档案和经学家的考证？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学术上的大忌，把年代的先后次序弄颠倒了。这就好比现在从事文字学研究的人，放着历代宿儒的抱着一本二十世纪的工具书《辞源》弄学术，这又能弄出个什么名堂？

[我有话要说](#)

[看别人怎说](#)

[留印象评分](#)

[与作者联系](#)

[推荐给朋友](#)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愿以此与徐友渔先生共勉

原载《南方周末》2000/7/27